

印迹 TRACES 트레이シーズ 흔적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LATION

本辑主编 酒井直树 花轮由纪子

江苏教育出版社

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
SPECTERS OF THE WEST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印迹》出版者

中文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南京马家街 31 号

电话: +86. 25. 3303497

传真: +86. 25. 3303457

电子信箱: traces@1088.com.cn

日文版: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区千代田橋

2—5—5 岩波書店編集部

Tel: +81.3.5210.4087

Fax: +81.3.5210.4153

韩文版:

Moonhwa Kwahaksa

#704 Namdo Bldg.

198-16 Kwanhun-dong

Chongro-ku, Seoul

Korea

Tel: +82.2.335.0461

Fax: +82.2.335.1239

E-mail: transics@chollian.net

英文版:

Traces Editorial Office:

388 Rockefeller Hall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14853-2502

USA

Fax: +1-607-255-1345

E-mail: traces@cornell.edu

宗 旨

《印迹》是一份多语种国际性学术论集,旨在关注在各特定地方所产生的理论知识的全球印迹,探讨理论自身是怎样由不同地点的实际社会关系所构成和改变的。我们渴望找到产生于完全不同地区的理论,包括那些过去几个世纪中常常由于殖民与半殖民而形成的在北美和西欧“理论”混杂关系中所产生的批判理论著作。我们所发表的研究论文、观点交流和评论,将面向多语种的读者,除了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批判种族研究,或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外,也包括各传统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同时,《印迹》也意在创造一种不同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与经验材料,不同理论思想本身的对话与争论的方式。

《印迹》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在这本论集的所有语言版本中出现。每一位撰稿人都将完全理解,她或他是为完全不同的、多种语言的读者写作:就像一位殖民统治下的当地知识分子一样,每一位撰稿人都需注意这种多向性。《印迹》形成和支撑着一个国际性空间,然而它又根本不同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刊物。国际主义刊物是建立在某一主导语言对其他弱势语言的主宰性基础上的。我们真诚希望,这一我们在其中争论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将挑战民族和民族语言所构成的空间。我们的这个空间由翻译过程构成,有多种语言和人员参与,通过我们之间的争论,通过作者、评论者、翻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而得以维持和扩展。

执行委员会

汪晖(北京), 高建平(北京), 王晓明(上海), Eun-shil Kim(汉城), Meaghan Morris(香港), 鹤饲哲(东京), Yann Moulier Boutang(巴黎), 小林敏明(莱比锡), 丁乃非(台中), 酒井直树(伊萨卡), Thomas LaMarre(蒙特利尔), 姜来熙(汉城), 小岛洁(东京), Brett de Bary(伊萨卡), 花轮由纪子(伊萨卡), J. Victor Koschmann(伊萨卡), Brian Massumi(蒙特利尔)

编辑

酒井直树(伊萨卡)

副编辑

高建平(北京), Thomas LaMarre(蒙特利尔), 姜来熙(汉城), 小岛洁(东京), Brett de Bary(伊萨卡), 花轮由纪子(伊萨卡), J. Victor Koschmann(伊萨卡)

编辑委员会

酒井直树, Thomas LaMarre, Meaghan Morris, Brian Massumi, 崔成模, Dipesh Chakrabarty, 汪晖, Eric Alliez, Christopher Fynsk, 花轮由纪子, Brett de Bary, 平谢, 赵刚, Ulrich Schneider, Anne Berger, 崎山政毅, Jon Solomon, Leo Ching, 丁乃非, Antonio Negri, James Siegel, Kwang-hyun Shim, J. Victor Koschmann, Peter Osborne, 于治中, Sechin Y. S. Chien, Elizabeth Grosz, Timothy Murray, 鹤饲哲, 黄平, Eun-shil Kim, 富山一郎, Ien Ang, 冈真理, Oliver Marchart, 高建平, Sue Golding, Yann Moulier Boutang, John Kim, Kenneth Dean, 小林敏明, 姜来熙, Jungwoon Choi, Wing-sang Law, John Kraniauskas, 王晓明, Alberto Moreias, Gabriele Schwab

顾问委员会

Tessa Morris-Suzuki, Ben Anderson, Harry Harootunian, 瞿宛文, Stuart Hall, 陈光兴, 伊豫谷登士翁, Jacques Derrida, 成田龙一, Soyoung Kim, Anne Berger, Beng-Huat Chua, Haejoang Cho, Benjamin Lee, Catherine Hall, 廖炳惠, Nora Bierich, Sandra Buckley, Tani Barlow, 柄谷行人, Gayatri C. Spivak

导 言^①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全球性的学术知识信息的流向想像成是某种图表,它显示出两种各不相同的趋向:其一是向心运动,也就是说,那些原生的、特定的事实资料从外围地域向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流动;其二则是反向的离心运动,也就是将关于如何进行知识分类、如何评估经验性资料、如何处理那些资料的多样性与不可通约性以及如何将那些来自外围地域的特殊资料的细枝末节转变成“西方受众”能够理解的信息运动。这第二种的学术信息通常被称为“理论”,而且与第一种信息所具有的特殊性相反,“理论”信息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不认为只有那些置身现场的人才能道出他们所关注的事实真相。这也就是说,第二种即被称为“理论”的知识并不认可那些在特定地域出现的原初语境中的原生信息具有直接的、可理解的性质,而是认为经过这种与“普遍形式”的联结,才可以为那些在现场之外的人士所理解。

这种方式下的知识生产,就主要是依据历史具体的智力劳动区分来实现的。在这种知性的知识生产流程中,“理论”是与“西方”这一历史建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理论”也正是由“西方”流向“其余”的世界。这当然并不表明关于学术信息的全球化流通的图像纯然是某种想像的产物,恰恰相反,这正表明了这一图像是一种具有全球规模的强有力而且充

酒井直树

钱 竞 译

分有效的社会性想像,进一步说,这图像被确定为某种规范系统,宣称现代社会就应当是这样的。

与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图形想像的知识背景相反,在西方与“其余”的世界之间的基本差别已经得到了确立,并维系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其间也有许多的变化。在这里有一个例证:竹内好先生是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他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他的观察。他或多或少将“东方”视为所有非西方世界的代表,认为“东方”只是在被“西方”或者说被欧洲击败的情况下才获致其自我意识的。^②如果缺少了否定,对于自我意识来说至关重要的反思性就将是是不可能的。否定性观念不会在东方自然产生,这种反思性的缺失确实由竹内好的“败北”一词表现了出来。他认为,“东方”在遭受欧洲的入侵之前,是绝不会意识到自身的。只有在承认自己丧失了自主性,承认自己对西方的依赖,或者说只有在“西方”的这面镜子中,“其余”才能通过反射获得自己文明的、文化的、种族的和国家的身份。^③

出于对现代性的启蒙价值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而又相信这只有在民族国家体制中才能实现,竹内好不能沿着历史的轨迹,而只能按照历史主义的观念去展望亚洲以及所有非西方世界的未来。正如许多在1930年代定型的亚洲和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他内化了现代历史主义信念。以至于对他而言,一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力量的有效斗争不能够绕过国家主体性的创造过程。他潜在的对于黑格尔体系的忠诚使他缺乏对历史轨迹的构想能力,而只能依靠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解。在这样的思路中,他认为,现代价值的落实和转用必须首先进行根本性的双重否定,既是对外力的否定,又是对内在的封建历史遗产的否定。为了使“东方”成为现代的东方,就要在吸取西方现代性的精髓的同时,从外部抵御西方,从内部克服自身的反动遗产。换句话说,东方是在依靠否定西方以及否定自身历史的同时使自己现代化的。没有对于西方的抵抗和否定,也就没有希望实现“其余”世界的现代性。竹内好先生还进一步追问:如果不是投身于反对殖民霸主与反对封建历史的压制性残余的斗争之中,人们难道还能实现具体的有实际意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吗?

如果人们没有看到竹内好先生对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行径怀有深刻的羞愧感,没有看到他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在1940年代

后期接手“大东亚共荣圈”的做法怀有强烈憎恶的心情,就不能真正理解他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追求。他将日本现代史看成是一个缺乏真正否定性的例证。这样的认识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什么对中国过分理想化。他认为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对西方的摹仿达到复制其帝国主义的程度,因此可以通过对西方干涉的否定以及对传统遗产的否定而实现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性。然而,除非是东方所应反抗的那个外在性能够得到确定,否则他所期待的历史辩证法很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对于“其余”地方的人来说,现代性被视为某种历史运动,这一运动在空间上通过一种对外在力量的否定使得一种被称之为“国家”的政治聚合体得到巩固加强,同时又在时间上通过对自己过去的克服而将自身构成一个主体,构成一个自决力量的代表。

在这样一个竹内好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图式中,国家的统一取决于所要抵抗的外在性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常常可以用图表来标示。正如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所表明的,应当受到抵抗的一定是那种来自所假定的国家统一体之“外”的力量。一个东方的国家,例如中国,已经置身于西方的势力范围之内,但是对这个国家而言,西方本身却是外在的事物。应当受到抵制的那种外在性也就因此可以理解为西欧与亚洲之间在地理意义上的距离。那种认为西方本来就内在于“其余”世界之中的可能性被有意识地排除了。尽管竹内好先生对现代化理论有着毫不含糊的批评,但是他不可能避开对全球图景的想像,而这又正是现代化理论的依凭。因此,对竹内好先生的这种历史意识,这种内化的历史主义意识的批判,应当成为我们关于新的现代性概念的出发点。

依据关于现代性的常规叙事,伴随着工业化发生在西欧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开端的标志。人们可以从一些历史的先例中寻找现代社会之现代性的印迹:例如 18 世纪英格兰的工业化标志,资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以及公与私的新的含义,一系列政治事件所导致的在主权名义下的政策自我合法化的最终确立,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如何通过代表自身而生产自身的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先例和随之出现的现代社会都被归结到一块想像出来的,被称之为“西方”的地域之中。随后,又常常断言那些作为现代性象征的事件统统是只在西方的范围之内发生的。进一步说,这个社会转型的单一过程的后果、影响和效能又被说成在那些遥远地区例如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当然还有亚洲被发

现、被观察到了。

在这样的叙事中遭忽视的,不仅是无可否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种族的以及宗教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状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这一地理区域,即 19 世纪的西欧和 20 世纪又加上了北美的所谓西方。此外受到忽视的还有一个事实,即西方的地理轮廓本身也是在这种现代化的历史叙事中创造出来的。

尽管西方被说成是一个远离于东方的单独的地理区位,它却被视为向世界的外围地域扩展和辐射。因此,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运动表现为一种放射流,正像前面说到的将“理论”信息在全球范围传播的图示所标明的那样。在这样的关于现代性历史的理解下,就会产生某种放射的幻象。缺少了这种幻象,欧洲中心性的观念就难以维系。毫无疑问,在这样一幅图景中,现代性的多样性是没有存身之地的。世界的历史主义图式使现代性的多样性破产,并将之演变成单一的拱形同质化过程,使现代性直接等同于西方化,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性以及“西方”的概念也就应受到质疑。“西方”概念的出现,正是因为现代性绝无可能设法从它的禁锢和它的放射性模式的控制中逃逸。

我坚持认为,现代性的来临并非由于单一的原因,具有单一的过程或者是单一的疆域。现代性的时间历程绝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寓于多样性之中。现代性总是在多姿多彩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当然,现代性的多样性也不必被理解为与地球上同质的地理空间并存的众多的起源。

尽管我们知道,二战后利用历史主义为美国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在国家身份构成的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利益服务的现代化理论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我们并不能完全避免在当代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之中常常使用的现代化理论的二元结构图式。由于它把现代性化约为现代化,又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以这样的图式所规定的世界就以分层的方式,构成了西方和非西方、现代与现代的“他者”、白色的与有色的。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二元结构的东西被看成是相互重叠的!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坚持寻找其他方式以讨论全球现代性的必要性。

现代性的放射模式作为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的基础,起源于一种对现代性基本要素从根本上的误解。不让许许多多的区域、人群、工业生产以及政治举措能够克服地理、文化和社会的距离而得到交流沟通的机会,现代性是不可思议

的。因此,没有翻译,现代性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此而言,现代性首先是人们跨越各种各样的距离而进行接触的形式。如果对人们相互间的接触的事实有误解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理解现代性的本质。交流沟通绝不是以单行线的方式从一方向另一方传送某种学说或价值。如果交流沟通不是一种社会性的关联,如果它不能使介入其中的活动与一方以上的人相关的话,那么无论是学说思想的传输或是商品的交换都将是无从谈起的。因此,交流能够使参与者双方都得到改变。如果一个社会的变化、扭曲或摧毁过程是以人们称为暴力的方式进行的,那么交流无疑是从一开始就会对有关各方造成危害的暴力事件。然而,在现代性的放射模式中流行一种经济学,在其中,西方就被设想成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动方面,而非西方世界总是被动的。因此,被看成是现代性内涵的观念、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于现代社会的构成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就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单向的灌输过程。正是由于有这种文明使命的文化主义幻觉,才会遮遮掩掩地把西方统一体说成是一个像本质化了的民族文化一样的超历史的实体。那么,根据现代性放射模式,交流沟通的表现形式在它成为一种描述之前就必定是一种政治的殖民主义的干涉。

全球范围的现代性的出现无疑在全世界伴随着频繁而剧烈的社会交往与商品交换,然而,这显然不能被描述为一个单向的同质化过程。在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中都将分别提出加强交流的透明度与价值的平等性的要求,否则将会引发社会交往中的不可通约性以及均衡关系中的不平衡。然而,这种不可通约性以及不平衡不应当理解为外在于交流沟通的语境。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应当忽视那些与历史主义普遍主义携手并行的恒定不变的种族观念、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观念提出独特的强烈要求。在对非西方世界提出的种族和民族文化完整性方面的文化主义要求,往往是与暗中归顺西方的文化统一性相匹配的。例如,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说辞无非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颠倒。

“理论”与“文化”的历史主义倾向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在知识理性上则是难以立足的。在今天,继续忽视这一点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那种关于全球性学术交流的流行观念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了,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所谓交流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受到了破坏,而且还因为依据历史主义的图示想像所设想的在世界上多个场所中存在的那种关系状态的观念也理所应当遭到我们的拒绝。那

样的理论界定对于当今世界多处场所发生的学术对话而言明显是太薄弱了。

全球的现代性已经在不同的区域加速了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位置交换,也使得各不相同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形态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相互作用。那么所谓“理论”的形态也就不再是具有“本土”性的了。“理论”经过包装进入了日常生活,这不仅出现在欧美世界,也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东亚和东南亚,曾经仅仅出现在欧美的东西现在也不复只属于欧美世界了,大量增加的事例表明,在非欧美地域的许多地方生活的某些方面要比北美或欧洲更为“西方”化。这种西方的多样化让我们得以发现在亚洲以及非洲当中有些人把自己改变成了“西方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人们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与欧洲中心世界里的种族化了的等级秩序不同的秩序。毕竟西方难道至今不仍是一个最有效也最有影响的文化主义想像吗?种族主义作为某种制度化了的欲望形态试图将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归顺化(naturalize)和非历史化(dehistoricize),关于西方的观念也不能使它的种族主义的含义纯净化,这正如文化主义是一种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群体的社会身份加以归顺化和本质化的最流行工具的功能一样。

那么,我们是否还要想当然地将西方看成是一种地图学范畴呢?我们还能够继续无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地理、种族、种族文化或是民族性上日益增长的在独立性方面的差异吗?是否仍然认为这依旧是文化资本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规定?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忽略那些经济的和社会的条件容许某些人在其他人不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有资格成为“西方的”?

理论的全球性呼唤一种真实的比较文化理论。我相信,《印迹》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所谓“比较文化理论”是指一种理论化的形式,它注重跨国的或是超越国界的链接,注重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具体地点的知识生产中所具有的全球性印迹,注重探寻理论在其他地方运作时其实际效果是怎样变化的。在这里提出的理论化的观点并不忽视行为的方式,这种行动由于差异而导致通约,并因此也就将异质性的事物置于比较研究的平面。这一先于比较并且使比较成为可能的行动就是翻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这项事业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翻译而进行组织。由于这一比较工作寻求在当代政治和暴力形式的核心之处去检验各种理论的基础和相互冲突的欲望,它的工作是具有政治性的。

显示这一事业在有关西方以及翻译方面的工作目标(既取其话题也取其地域意义),就是这第一辑《印迹》的主导动机。在《印迹》的各类文章中,读者将要面对的文化批评与政治批评已经为许多置身于南方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所完成了,这里的南方包括南亚、南部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同样,来自北大西洋地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怀有在非欧美地区对欧美观念进行改造性传播的愿望,也乐于使非欧洲理论遗产及其政治前途见之于北方地域。这正是一种将其他地域的印迹作为馈赠而置于具体的本土文本的批评形式。

《印迹》的目标是启动一种不同的学术对话与学术争论的交流,一种不同的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与实证数据资料的交流,一种不同的学术信息在全球流通的实例。这一辑的标题是《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它强调的是在人文学术中知识生产如何由于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而成为挥之不去的问题,以及翻译是怎样服务于现代性的意义创造的。下一辑《种族的恐慌和移民的记忆》,将探寻有关种族的记忆和全球性移民政治的问题。再接下的各辑可能会论及现代性在19世纪末期以及20世纪早期在世界上的影响。例如浪漫主义美学与殖民主义在南亚和东亚造成的伤害,以及现代主义美学与先锋艺术的今日命运等等。

我们这些论集的特殊取向表明,我们急切地寻找在其他地域产生的理论,有时甚至寻找对于北美及西欧“理论”的混杂式反应,例如作为最近几个世纪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后果的反应。举例而言,东亚、南亚以及非洲学者对欧洲哲学的研究就将受到积极欢迎。《印迹》将要开创和维持一个理论交流的国际空间,它将依靠多种语言媒介以刊行多种语言的文本。

为《印迹》所接受的每一篇文章都将会被译为本辑所使用的多种语言,^④为《印迹》撰写的文章也是以多种语言的读者为对象的。作者用本辑的一种语言写作,就可以被人们用朝鲜语、英语、日语以及汉语阅读。我们希望每一位向本辑投稿的人都能充分了解他们的写作都像是在对多种语言的听众发表演说:正像在殖民统治下的本土知识分子一样,每一位撰稿人总被要求以一种歧义的方式来言说。这个我们可以争论和交谈的社会空间与民族语言空间,即一种同质语言媒介的民族空间完全不同。在这层意义上,《印迹》是国际性的论集。在本辑所运作和维护的这一国际性空间内,无论是撰稿人还是读者都会受到欢迎,然而它又根本不同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刊物。那种刊物是建立在某一主导语言对其他

弱势语言的主宰性基础上的。恰恰是由于认识到要避开主流语言对弱势语言的主宰性是多么困难而近乎不可能,我们才承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在此绝对必要的是以翻译的方式作为郑重的补充。这是一个依托于翻译来支撑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是借助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多重翻译组合而构成的。

我们无法构想翻译工作可以在同一文本的两种语言的两种版本之间去确定语义上的对等。换句话说,翻译并非依据某种交流模式进行概念化的处理,比如说依据前面所说的放射模式的处理。相反,我们理解翻译作为一项操作是具有开放性的,是向人们提出的询问和交互询问的各种可能性开放的。对于同一个文本的处理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翻译对于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人提供了对话的便利,否则他们之间是无从交谈的。并且,这也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即翻译的恰当和有效性能够得到持续的讨论和争辩。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能够知道相互之间存在的错误理解和错误翻译,而且也能够认识到最为紧迫的是努力去相互理解与翻译,以便于我们能够发现我们是怎样误解和误译的。这样,翻译自身就可以通过争辩掌握什么才是应该准确传达的。《印迹》这一国际性空间正是通过翻译信息的同一性而使围绕着它的争论成为可能。参与到《印迹》的国际性空间中来包含着—项承诺,就是凭借译介他人的词语来保持这种讨论的连续性,同时也是在质询那些视为当然的学术知识和非学术知识。

我们这些已经聚集起来从事于这一事业的人,同样会成为通过因特网并运用多种语言进行网上对话支撑力量。我们也将为论集创造一个万维网址以便于读者同编辑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们还要以印刷方式出版《印迹》。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深信,真正的国际合作对于《印迹》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

注释:

- ① 这篇文章是从《印迹》的计划书发展而来的。这份计划书系由托马斯·拉马尔、平谢与我合作写出。我愿在此向两位合作者表示感谢。但是仍应由我来对这篇文章的内容负责。
- ② 竹内好《中国与日本的近代性》(1947年初版),收入《日本与亚洲》(东京:筑摩书房,1993)第11—57页。(该文又以《什么是近代性?》为标题在1948年发表过)有关讨论现代性(日文译为近代性)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见 Sakai,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收入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7.3 (1988年夏)。

③ 竹内好,同上第 15—19 页。

④ 《印迹》的编辑集体将在原则上遵守这一规则。但是,这一规则将不适用于那些在版权安排上不允许某一文章翻译为某一种语言和在某一市场上出版的情况,它也不适用于那些处于《印迹》的编辑集体控制能力之外的,由于所在国政府的政策而使部分内容不能出版的情况。

目 录

酒井直树	vii	导言	钱 竞 译
I 西方及其变迁			
鹤饲哲	3	一种情感的未来:羞耻的历史性	代显梅 译
平 谢	38	具有普遍性的地区:一个变动着的世界中的亚洲研究	代显梅 译
酒井直树	74	西方的错位与人文学科的地位	代显梅 译
约翰·克拉尼奥斯科斯	98	翻译与跨文化操作	季忠民 译
<u>插页</u>			
琼-卢克·南希	117	印迹	钱 竞 译
守中高明	120	Restance 琐记	高建平 译
于治中	122	多样性	
布雷特·德·巴里	124	为《印迹》创刊号而作	高建平 译
车前子	126	符号:从一封信得到的灵感	

II 理论与地域的政治学

- 姜来熙 129 摹拟与差异:新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幽灵学
马振涛 杨淑学 译
- 迪普西·查克拉贝蒂 162 作为印度历史中的一个问题的欧洲
代显梅 译
- 乌尔里克·约翰尼斯·施奈德 188 智力攫取算不上掠美行径
季忠民 译
- 白露 200 外来因素与中国妇女区域研究中的女性
主义幽灵
高建平 译

插页

- 雅克·德里达 235 致《印迹》的一封信
钱 竞 高建平 译
- 克里斯多夫·芬斯克 238 理论中不存在邂逅
钱 竞 译
- 姜尚中 240 交流
钱 竞 译
- 柄谷行人 242 通向“无产阶级专政”
钱 竞 译

III 翻译与现代性

- 刘健芝 许宝强 陈顺馨 247 翻译的政治与问责性:一个香港的故事
温 奕 译
- 王晓明 275 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 80 年代的
翻译运动
- Kim Soyoung 290 悬疑的现代性——韩国电影中的拜物逻辑
王宇洁 译

彼得·奥斯本	308	作为翻译的现代主义	王宇洁 译
		<u>插页</u>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	323	多元共鸣	高建平 译
崎山政毅	329	抵制“个性化技巧”与翻译的形成	张欣 译
Chua, Beng Huat	331	多样性	钱竞 译
维克托·科西曼	333	翻译	张欣 译
哈里·哈鲁图尼安	335	模式性	钱竞 译
		IV 国际主义与印迹	
刘健芝 彼得·奥斯本	339	北京座谈	高建平等 译
汪晖 酒井直树			
		<u>插页</u>	
埃里克·阿里茨	367	《印迹》A B C D ……	高建平 译
车前子	369	最后是夜晚	

I

西方及其变迁